

蒋介石和国民党(上)

■ 王奇生

【提要】 历史钩沉，透过《蒋介石日记》，了解蒋介石的成长经历，解读他的性格特点，还原了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蒋介石：幽暗、多疑、敏感，浓郁的“雪耻”心，事无巨细和越级指挥式的独裁，以及心态平和的晚年。

【关键词】 日记 蒋介石 性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1)11-0050-05

回想二十年前，对国民党史和民国史的研究还被称为是一门“险”学。应该说最近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空

间越来越宽松，但是没想到最近几年来又有一个新的动向：来自于社会上一些愤青的抵制。对这些愤青来讲，几乎不能说国民党不好，不能说蒋介石不好，你一说那就是成王败寇，他们就会跳起来。在台湾也有同样的趋势。大概在去年年底，台湾“国史馆”在他们的网站上做了一个调查，让网民投票选出“民国百年”来在各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投票结果里，政治方面毛泽东排在了蒋介石前面；军事方面邓小平排在第一。所以活动开展到一半，就被台湾当局制止了，因为“国史馆”是官方的机构，国史馆的馆长也因此而辞职。可见，他们现在遇到的这种转向跟我们现在的转向基本上是相似的。

那么，我们现在如何来看蒋介石？我认为蒋介石一生干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不间断地记日记。历史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必须依赖史料。历史上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没有留下史料而不被历史学家所重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现在被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人，往往是因为他留下来的史料非常地庞大、非常地丰富。

现在蒋介石的日记开放了，因为有他几十年的日记，学界看完以后对他的研究确实有所深化。当然历史学家们对蒋介石的看法还存有很大的差异。看完他的日记以后，我想对他的性格、个性，谈一点自己的

看法。

一、蒋介石性格的形成

蒋介石8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是他的寡母把他养大的。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是我的好朋友，他专门研究知识分子，很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说中国历史上一些成功、成名的人很多是由寡母抚养大的。我们看蒋介石的日记，有一点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对母亲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他几十年的日记里不停地表露出来。逢年过节，或者是他母亲的生辰、忌日，包括他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经常会在日记里怀念他的母亲，一直到老年。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他对他母亲感情之深厚异乎常人。另一方面，他对他父亲感情之冷漠也有些异乎常人。翻阅他几十年的日记，我只看到有一处简略地提到：“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这“不忍言”三个字里，我想包含了他对父亲的复杂情感。

我们知道毛泽东跟他父亲的关系也不好，对他母亲的感情也很深，但是，相比之下蒋介石好像更突出一些。我的感想是蒋介石有恋母仇父的情结。蒋介石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蒋介石的父亲是他母亲的第二任丈夫。蒋介石的母亲在生前反复叮嘱蒋介石说，我死了以后，千万不要把我跟你父亲葬在一起。蒋介石在日记里说，是他母亲担心与父亲合葬会“惊动”父亲。这是蒋介石自己的解读。台湾李敖先生



的解读就不一样，他说蒋介石的母亲因为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他父亲的左右两边已经各葬了一个女人，她如果要跟他丈夫葬在一起，中间必然隔着一个女人。这种说法可能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想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蒋介石母亲跟他父亲生前的关系非常不好。“惊动”之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夫妻两人总有一个先死，一个后死，如果要同葬的话，后死的一个肯定要“惊动”前面一个。这是中国文化允许的，不存在惊动不惊动的问题。

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胡适，胡适也是少年丧父，大概三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但是胡适的一生受他父亲的影响非常大。按道理讲，他三四岁时父亲就死了，怎么会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这要归功于他的母亲。据胡适回忆，他记忆中对他父亲没有印象，但是，他母亲将他父亲塑造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形象，从小灌输给他。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他母亲就跟他讲他父亲的故事，说他父亲当年如何了不起，所以从小在胡适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很高大的。

回过头来再看蒋介石。我想蒋介石八岁的时候死了父亲，他对父亲应该还有记忆，却为什么几十年都不愿提及，以至于外界对他的身世有各种猜测甚至谣言，他也不加澄清。蒋介石信奉儒家文化，他在日记里有意塑造一个孝子的形象，但作为孝子为什么只对母亲念念不忘，而对父亲却哑口不提？我想他父母生前的关系可能很不融洽，甚至他母亲可能从小给他灌输的是他父亲如何如何不好。蒋介石小时候非常调皮捣蛋。他小时候的名字叫瑞元，奉化乡亲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瑞元无赖”。“瑞元无赖”在当地流行了很长时间。可能也因为从小缺少父亲的管教，母亲又非常地宠爱他，造成他后来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的个性。实际上，蒋介石不仅仅是在一个寡母身边长大，他还有一个外祖母，也是很早就守寡，他实际是在两个寡妇的抚养下成人的，所以他的性格里有很多女性化的性格特征。他非常地细致、敏感，还非常爱整洁。蒋介石说，他十五六岁在外面上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见了母亲都是抱头痛哭，声音邻居都能听得见，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跑来看，其实就是因为他回到母亲身边以后一种情感的爆发。他说一直到二十多岁，还是不乐意离开他母亲，每次出门都要被母亲赶出家门。他自己也觉得，一个大男人二十多岁还

这么恋母亲，自己都觉得不可理解，自己都认为“非同寻常”。

看蒋介石的日记，看他回忆早年的成长经历，在他身边除了他的母亲好像就没有一个好人。对父亲，他只有“不忍言”三个字；对兄弟，也没有什么好话。他总共是兄弟三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但是同父同母的弟弟在三岁的时候就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比他大十几岁。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的母亲就来主持分割他们兄弟的家产，那时候他的弟弟还没死，所以他母亲就把全部家产一分为三，兄弟三个每人一份。但是家产分完不久他小弟弟就去世了，于是他的大哥就不干了，说家产要重新分，原来是一分为三，现在要一分为二，而蒋介石的母亲坚决不同意，他的哥哥几乎要跟他们打官司，闹得兄弟反目成仇，所以他提及他的哥哥也是没什么好话。另外，还有一点，一直到晚年，蒋介石在日记里一提起他的私塾老师都是非常地愤恨，用极其恶劣的语言来说他的老师。他有一位私塾老师叫任介眉，他说任介眉简直就是恶魔，幸亏他教了我一年的书就死了，如果他不死我肯定就死在他手上了。而且他后来在上海寻花问柳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妓女，他在日记里记下的那个妓女的名字就叫任介眉。我想不至于这么巧吧？这个姓和名字都不常见，她怎么会那么巧地跟他的老师同名同姓？我猜想可能是他有意这么做的。

蒋介石的日记我觉得他可能有做手脚的。比如说他叫宋美龄三妹，他跟宋美龄结婚大半年以后，他在日记里轻轻一笔提到“三妹小产”，就这么几个字一笔带过，我怀疑这是他写给我们后来这些搞历史的人看的。我们都知道他跟宋美龄没有生育，这样的事情按常理来讲，即使不对蒋介石，对宋美龄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那么轻轻的几个字把它带过去，一点都没有发表感想，很不合情理。实际上蒋介石在日记里经常发表感想，他的情感、喜怒哀乐在日记里大量倾泄，而对“三妹小产”却如此轻描淡写。他跟宋美龄结婚的时候，社会上已经传闻他早年在上海滩吃喝嫖赌，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我怀疑他是不是故意写给我们看的，证明他还很正常。而且他有一天的日记里就写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没有真相的，真相是不会说出来的”。他这么写，就是写给我们这些研究历史

的人看的。

蒋介石对他的日记非常重视。他爬上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以后，就让秘书把他的日记摘抄、备份，而且还要分类把它抄下来，分成政治、军事、家务等等。他还要秘书在他日记的基础上编年谱，抗战之前出版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他让秘书编的年谱，而且日记里反复提到他怎么一字一句的亲自修改这个年谱。后来他又让秘书根据他的日记来编《事略稿本》。现在《事略稿本》还保存在台湾的“国史馆”，数量非常庞大。他的《事略稿本》除了日记的摘抄，还加上很多电函和讲话稿。近年来，“国史馆”将《事略稿本》出版，已经出了四十多本，还没出完。这么庞大的《事略稿本》，即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还抽时间一字一句地修改，可见他很重视自我形象的建构和自我历史的塑造。

蒋介石提起他的父亲、兄长、老师，以及他的亲戚朋友、乡里邻居，都没有好话。他回忆说，他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年发大水，左邻右舍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帮他家忙的。蒋介石一直到三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作为，不大被乡亲们瞧得起。所以他在日记里经常怀恨，恨他那些乡下的父老乡亲。他说乡亲们瞧不起我，我自己无所谓，只是让我的母亲很伤心。当他后来爬到最高的权力宝座以后，带着他的“三妹”衣锦还乡。溪口镇的乡亲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提灯晚会欢迎他，唱戏唱了三天三夜。他说本来我不喜欢“欢迎会”这一套，但是这一次乡亲们的欢迎会我一定要让他们做，因为我要“雪耻”。几十年来乡亲们瞧不起他，现在总算扬眉吐气。

在蒋介石的心里，有非常强烈的“雪耻”意识，早年要雪他个人的耻，执掌国家权力以后要雪国耻。所以，在他的日记里专门有一个栏目叫“雪耻”，“雪耻”几十年，天天写。他觉得自己从小是一个受冷落、受欺负、受压抑的角色，所以他记忆中留下来的都是恨。你想，一个从小对父亲、兄长、老师、乡亲、学友都充满恨的人，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生存境遇，多么阴暗凄惨！这样的早年成长经历，又将如何铸造蒋的人生和个性特质？在蒋的一生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和孤立无援的童年记忆被反复提及。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僻的个性。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信赖。正因

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敏感的性格和“雪耻”情结。

二、蒋介石鲜为人知的性格特点

蒋介石在早年的日记里，常说只有母亲是可信的，后来跟宋美龄结婚以后，说只有母亲和妻子是可信的，其他人都不可信，类似这样的话语在日记里反复地提及。他这样一种对人缺乏基本信赖的心理，对他性格的形成，对他个性特质的塑造，绝对会留下很深的阴影。

蒋介石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因为对人缺乏基本的信赖，即便在权力宝座已经坐稳以后，他都经常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所以他的手下，绝对都是两套以上人马。为什么？他要让下属之间互相制衡。同样是拥蒋派系，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足鼎立。同样是特务，既有中统，又有军统；财政既用宋子文，又用孔祥熙。很多方面他都是两个系统，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竞争，互相打小报告，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本来像陈立夫应该他比较信得过的人，但陈立夫在晚年回忆的时候也说，蒋公其他都好，唯一的缺点是“好使部下对立”。宋美龄跟他结婚以后，也提醒他，说他“防范太过”。包括他把党这一块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后来他发现二陈的势力太过于膨胀了，所以到抗战时期又成立了三青团。千万不要认为国民党的三青团跟共青团一样，它名义上叫三民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政党。三青团成立以后，蒋介石有意让它跟国民党形成竞争。党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非常地激烈。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发现整个党的系统被二陈兄弟控制以后，二陈的势力太膨胀了。1935年国民党五大的时候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投票，陈立夫所得票数竟与蒋介石一样多。心滋不快的蒋介石乃以红铅笔将陈立夫、陈果夫的名字往下勾若干名，并不准公布票数。这事只有记票的秘书是清楚的，陈立夫自己都不清楚。这个秘书叫王子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秘书，负责会务工作，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情。王子壮的日记确实确实是写给自己看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大人物。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



要看王子壮这样的人的日记，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情况，他完全是实话实说。

蒋介石的一生中，很少有人被他长期的信任。很多人被他用一段时间，就被冷落到一边去了。较长时间被他用的人，也就是他的几个亲戚，比如宋家、孔家。二陈兄弟为什么跟他有点沾亲带故呢？因为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人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当年蒋介石跟陈其美结拜过兄弟，所以他一直把二陈兄弟看作是自己的侄子，所以尽管对他们也防一手，但是他还要用他们，他觉得这些人毕竟是沾亲带故的，还比较可信一点。还有就是他的学生，他尽量建立起一种师承关系，所以黄埔系也是他相对比较信任的。

蒋介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事无巨细，都喜欢亲自亲为。大家在没有看蒋介石的日记之前就知道蒋介石很独裁，但是我看完日记以后更觉得蒋介石独裁，什么事都要管。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七、八年前重庆市档案馆公布过一批蒋介石的手令。在那之前，我总以为手令的内容肯定是一些党国大事，很重要，但是没想到重庆市档案馆公布的那一批蒋介石的手令，大概好几十封，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重庆街头哪个地方有一堆垃圾，好几天了，发臭了，他下个手令让人把那堆垃圾清了；街头哪个地方有个乞丐影响市容，也下个手令让部下处理一下。我当时以为，可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手令就留在大陆不要了，那些重要的可能带到台湾去了。我后来在台湾“国史馆”去看，蒋的手令固然是有很多重要的，但同样有很多是鸡毛蒜皮的。他什么事都要操心，都要管。他有一篇抗战时期的日记里说，早上六点钟给陈诚打了个电话，说是警示他不要睡懒觉；又有一篇日记说，孔祥熙站着的时候喜欢左右摇摆，站没站相，我要提醒他；叶楚傖吃相不雅，我要提醒他；陈果夫长期的老肺病，带着痰盂，影响党国形象，我要提醒他。诸如此类很多细小的事情他都在日记里操心。

我们看蒋介石觉得他更多的还是一个军人，但是他最反对人家把他当军人看。他的自我定位是什么？有三个：第一，他认为他是革命家；第二，他认为他是豪杰；第三，他认为他是圣贤。

北伐前后，蒋介石还多少能够听取党内元老和同

辈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当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成为真正的最高领袖以后，自我认知越来越膨胀。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已超越“豪杰”而以“圣贤”自期：“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抗战爆发以后，他进一步赢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其自我感觉也更加膨胀：“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相隔一年，从“以圣贤自期”，到“以圣贤自待”，仅一字之差，感觉已大不同。

但是，即便是真圣贤，如果国内国外、举国上下什么事都要操心的话，恐怕也力不从心。我们看国共内战的时候，延安那边虽然是以毛为中心，但至少还是有那么一个集体的智慧在商量，而国民党这边就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在冥思苦想。他自己也知道，但他觉得很无奈。他在日记里说，当年打日本，他是“以一人敌一国”，现在打共产党，他是“以一人敌一党”。他手下有个叫熊式辉的，委婉地给他提意见，说您不必什么事情都亲历亲为，一等的领袖是重视制度，二等的领袖是重视人才，三等的领袖才是什么事都自己干。蒋介石听得出来熊式辉的意思，但是他说，党内无人啊！他认为是因为党内无人，所以很无奈，他没有办法。

既“以圣贤自待”，自可乾纲独断，而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强烈的自恋，势必藐视一切。读三四十年的蒋介石日记，一个深切的感受，是他对部下和身边人的评价大多是“无能”、“无用”、“愚蠢”、“幼稚”。他自认为是豪杰、是圣贤，所以虽然在日记里面老是表示求才若渴，但是没有几个他看得上的。这个人有长处，马上又来个“但是”，有什么问题；某人这方面还可以，但另一方面又有什么问题……就总是不能以欣赏的眼光去看他手下，所以他经常感慨的就是党内无人。其初不信任人，进而目空一切；其初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信任，进而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赏识，对手下人和党内干部，多是责备乃至痛骂，久而久之，手下人也就唯唯诺诺，也确实无人能为他分劳分忧了。

在蒋看来，军事将领“无能”，只好自己越级指挥；行政干部“无能”，只好自己兼职数十。整个党国

“无人”，也就只好自己“独裁”了。

我们过去说蒋介石独裁，现在来看，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会独裁。他经常感觉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他自己兼了很多职务，多到四五十个。过去我们说蒋介石兼那么多职务，是因为他对权力的嗜好。但是你想，他本来已经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了，有必要往下兼职吗？比如四川省的省主席空缺了，他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自己兼着；行政院院长空缺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先自己兼着。这还好理解一点，还有一些相对低级的职务他也是自己兼着。所以你想，想象不到他的兼职会那么多。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权力欲望，因为他的权力已经到巅峰了，他还在乎去兼一个职务吗？他是觉得真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没办法就只好自己兼了。

蒋介石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在军事上，他特别喜欢越级指挥。有的时候他越过高级将领，电话遥控直接指挥前线怎么打仗，指挥完以后还要骂这些高级将领无用，居然对战场的信息都不知道，还要打电话来问他。问题是他越过这些高级将领指挥，高级将领当然不知前线的消息了。有一天蒋介石日记里说今天手很酸，因为电话指挥前线作战，四五个小时没放下来。他也是认为这些军事将领无能，所以没办法，只好自己亲自指挥。

国民党政府实行五院制，有一整套完整的行政系统。但蒋介石把正式的行政系统都撇在一边，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非正式的系统。非正式系统中最核心的是侍从室。所有的政令都是通过侍从室往下传达，所有的信息也汇总到侍从室，所以他基本上完全靠侍从室来运作。什么行政院、各部委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国民党的中常会、中政会经常成了一个摆设。中常会、中政会经常开会，但蒋介石很少参加。他的想法是：让你们开去吧，反正最后听我的。他把那些正式的官僚系统都撇在一边，完全靠一套非正式的系统来运作。

除了侍从室之外就是特务系统，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不完全是杀人，更大的功能是收集各方面情报。蒋对政情的掌握完全靠他的特务系统来提供。还有就是之前讲到的他的手令，正常来讲他应该有一个正规的公文传输系统，下一个文件可以通过正常的系统层层

传达下去，但是他不，他就是爱用手令。什么叫手令，就是一支红铅笔，写一个便条，这就是他的手令。

我们知道蒋介石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训话，训话几十年他都不厌倦，经常在日记里说今天连续训话两个半小时，“不知疲倦”。但是他训话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儒家的四维八德。他特别重视道德的训诫。过去我们讲国民党怎么专制、独裁，好像国民党很厉害，很强大，认为他的特务系统非常地猖獗，这些都没错，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想，特务系统猖獗是因为他把正规的系统、党的系统撇在一边，没有好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他特别重视特务系统。蒋介石对付反体制的知识分子常用暗杀，所以被称作白色恐怖。不过相对于明杀来讲，暗杀还是有所顾忌的。

我简单地讲一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同。这个问题牵涉的面非常广，我只谈一点感想。看蒋介石的日记，觉得他晚年的心态比较平和，这点很重要。他晚年心态之所以这么平和，可能是因为他有安全感，而毛泽东到晚年恰恰缺少安全感。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他的接班人问题解决得好，而毛泽东的晚年可能恰恰是因为在接班人这一点上出问题了。蒋介石在权力的交接方面没后顾之忧，所以他心态很平和。这里面个人的因素很关键，权力越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力就越重要。蒋经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实际上你问台湾的人，他们会说小蒋跟老蒋在专制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甚至说蒋经国时期特务更加地厉害。小蒋与老蒋不同的一点，是小蒋比较亲民，但是他在专制独裁方面一点不亚于老蒋。但是，小蒋干了一件事，整个影响了历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开放党禁，一下把台湾引向民主，非常聪明，非常英明。他知道民主是大势所趋，在没有第三代蒋家接班人的时候，何不干一件青史留名的事情？当自己来日不多了，宣布开放党禁，让你们去搞民主吧。这可能就是蒋经国当时的想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魏静茹